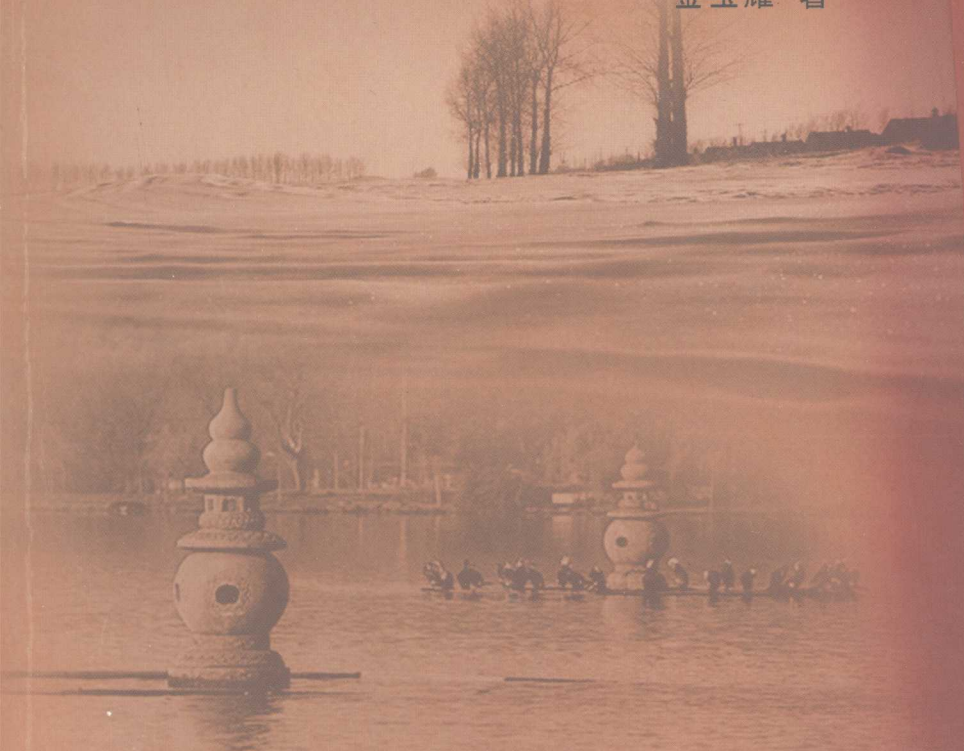


平民往事

(上册)

金宝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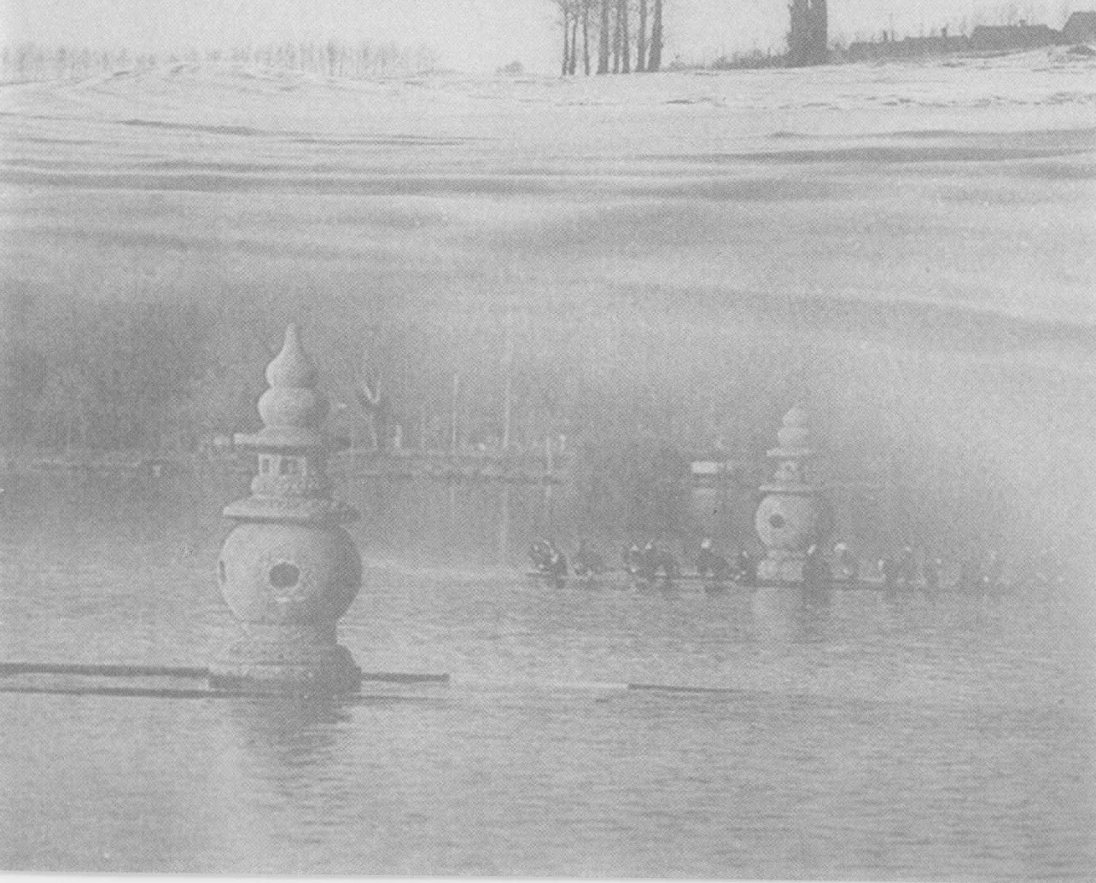


杭州出版社

平民往事

(上册)

金宝耀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民往事.上册 / 金宝耀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758-114-7

I. 平...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0875 号



引子 / YINZI

灰蒙蒙的天空笼罩着杭州城。一向被世人称作明珠的西湖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西北风吹皱了深绿色的湖水，细细的涟漪随风向远处一阵阵地展去。湖岸边的水面上，败落的荷叶等待着来年的生机。白堤上，桃树秃的枝丫，显得僵硬乏力。柳树的叶子早已脱光了，只剩下纤瘦的柳枝在风中懒懒地摇摆着。

远远望去，西湖在一片灰色的萧条之中。只有小枫树还舒展着枝叶，迎着凛冽的寒风，呈现出一年中最后的殷红。这样的枫叶在西湖边，园林中，溪水旁，山路上，随处可见，只是没人注意罢了。在人们的心目中，红色象征着革命。尽管这小小的枫叶红得自然，红得深沉，红得别样。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折腾了两年多了。学校停课，学生辍学，在校的“三届生”成了巨大的社会包袱。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引子 / YINZI

当时，杭州与全国各地的城市一样，一部分在校的“三届生”怀着对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心情，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踊跃报名上山下乡，奔赴祖国的农村边疆。他们慷慨激昂，立志在广阔天地里炼一颗红心，干一辈子革命。

当一些中学生还在热衷于“文革”的愚忠和浮躁时，有人却早已厌倦了这种非常政治化的运动。当时，仍有许多在校学生没有响应伟大的号召。他们并不愿意盲目地接受这样的“移民运动”，而是持冷静的态度理智地思考：离校后该如何走向社会？

但是，社会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滞留在学校的“三届生”最终被转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继续接受上山下乡的动员，他们成了支农的对象。这场上山下乡的动员力度绝不亚于共和国历次的政治运动，他们难以逃脱这场来势凶猛的上山下乡运动。

从此，这批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年轻人踏上了社会，得到了历练和成长。由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相同的人生道路，演绎出各不相同的苦乐和悲喜。

第一輯

平民子弟





目录 / MULU

引 子	
动 员	1
离 别	79
初到北大荒	111
再教育	139
依靠谁	171
探 亲	194
初 恋	220
磨 砺	252
创 伤	284
家有难事	349
违 心	398
向 往	417

—动—页—

1

邬水康原是一个靠蹬三轮车挣钱糊口，成天混迹于街头巷尾的小人物。他中等的个子，一张精瘦的面孔，高颧骨尖下巴，一对招风耳。那是爹娘给造就的，他也没法改变。因人微言轻，他从来就是听人摆布由人使唤的。尽管他心里极不平衡，却又不肯外露。邬水康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即便是不要手段也在所不惜。“文革”时，邬造反有功，批斗“走资派”积极，“文攻武卫”有能力，终于时来运转，得到了赏识，当上了造反派的小头头。最近，他被派往城区的街道担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主要任务是全面主持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

那天，邬水康踏着一辆公家牌照的自行车急急地返回街道办事处，人还未坐稳就叫来助手，通知所有工宣队员和街道干部，马上前来参加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传达市革委会领导的讲话精神。

会议准时召开。邬水康坐在会议桌的一端，四周围坐着归他领导的一班人马。他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们，喝了口水，挪了挪放在桌上的笔记簿和那本不离身的《毛主席语录》，清了清嗓子。

“坐在后边的那一位……”邬水康摆手示意把门关上，然后煞有介事地说，“我们先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最高指示。”他翻开已经准备好的《杭州日报》，看着头版念了起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所有与会人员早已习惯了这种开会的形式，他们中有抽烟的、喝水的，还有交头接耳聊天的。邬水康视而不见。

过了开场白，这位邬队长切入正题：“是这样，我刚从市里开完会回来，上级领导部署给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由我们工宣队牵头，抽调精兵强将，会同街道革委会组织一个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小组，把那些长期滞留在家的‘三届生’动员到农村去。这一次，他们是非去不可的！也就是说，上级要求我们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

12月22日发出的最新指示，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把支农对象百分之百地动员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是最高指示，叫他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现在，我们已经接收了从市教育局革委会转来的所有‘三届生’，接着就是摸底排查各居民区的动员对象的情况……”

邬永康显得十分激动。他站了起来，离开座位，指着挂在墙上的那张街道辖区的示意图，像一个作战指挥员站在军事地图前，边说边比划，讲解他的作战意图。

“据了解，我们街道的‘三届生’特别多，任务也特别重。有的一户人家就有两三个的……你们看，这里是法院路居民区，这里是弼教坊居民区，还有这里是官巷口居民区……我们要调动一切力量，集中优势兵力，自南往北各个击破，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邬永康在这张辖区示意图前说了一通回到座位前，拿起茶杯喝了口水，用手掌抹了一下嘴巴，然后双臂呈“八”字形地撑在桌沿上站着，他继续说：“大家看看有啥个高招，你们也可以出出点子嘛，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说完，他又扫视了一下在座的。

邬永康就像策划一场械斗那样，作了个战前动员的讲演。

刚从茗壶澡堂借用过来充当工宣队队员的擦背师傅，人称“陆二”的站了起来，他眯着眼睛，随手将嘴边的烟头摘下，说：“邬队长，听你的。叫我怎么弄，我就会怎么弄……”

还没等陆二说完，人称郎大嫂的也扯开一只破竹罐喉咙抢过话题，说：“跟以前的做法一样，我们没日没夜地坐在动员对象的家里，让他们的阿爸姆妈都没得安耽，叫他们颠三倒四地过不来日子。这样，就能把这批小鬼弄出去了！”她说完，在座位上扭了扭屁股，脸上摆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像是她与这批还未踏上社会的青年学生有什么仇恨似的。于是，人们在会场上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邬永康具有丰富的“群众”斗争经验，并不在乎人们究竟在说什么，认为只要能煽起部下的“革命”热情就可以了。

接下来，邬永康自有谋略。他摆了摆手示意队员们不要讲话，又

清了清嗓门儿，一本正经地说：“是这样，根据上面的要求，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大造特造上山下乡的革命舆论，在街上刷大标语，给居民干部开会，配合上面做好最高指示的宣传工作。让那些‘三届生’心里明白，家里是呆不下去了。我打算在工人文化宫弄几个空房间，把这批动员对象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先让他们坐下来，提高认识嘛！我们加强动员力量，直到他们自己去派出所迁出户口为止。如果有调皮捣蛋的，不服从的，可以揪出来批斗嘛！搞几个典型，杀鸡给猴子看看，也是有必要的嘛！学习班可以搞通宵，可以搞车轮战。这个嘛，就要辛苦大家了，晚上加班还是老规矩，每人两角钱的夜餐费。”

会议持续了个把钟头就散了。参加开会的人们一个个晃出了会议室，剩下的是乱糟糟的一片：横七竖八的条凳、骨牌凳，还有狼藉满地的烟蒂。

邬永康叫来了助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鬼，把今天会议记录整理好，到时候，向上级汇报总不能空口说白话，没个东西……”他想了想又说：“还有，你叫几个人，分头到居民区去摸一下底，究竟有多少个‘三届生’，列个名单出来……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说完，推着自行车走了。

“文化大革命”如同翻江倒海的大潮，它以“史无前例”的迅猛，冲刷着一切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同时，这大潮也泛起了那些久匿于人们灵魂深处的肮脏和丑陋，并且像瘟疫一样毒化着社会风气。一时间，浮躁和狂妄、愚昧和无知成了社会的主流，在“革命”和“激进”名义的掩护下，一部分人可以无法无天地去捉弄，甚至迫害另一部分人。邪恶亵渎着传统的良知和道德。

在人们的记忆中，从1955年开始，上山下乡的运动似乎就没有停歇过。“三反五反”运动中，一些有问题的人被迁往了农村；1957年的“反右”结束后，也有许多人被下放到农村；60年代初，在“精简”和“四清”时，又有不少城里人，被迁至农村。如今，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又掀起了一个空前的支农运动。上山下乡似乎成了历次政治运动过后的必然了。

一年一度的西北风吹进了杭州城，树叶都从树上纷纷地脱落了。西湖边上的那几棵小树还剩下了几片枯萎的叶子。人们都知道，这些叶子过不了多久也要落地了。这年的冬天，杭州城里似乎特别冷。

由街道组织的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如期在工人文化宫的电影场里召开了，坐在台下的全是辖区内的“三届生”。会场里座无虚席，过道上和会场外也站满了人。

组织者在台上按照“文革”期间的规矩，认真地履行会前仪式：全体起立，齐唱《东方红》一曲，然后所有的人拿出红宝书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最后，组织者打开红宝书读几段与大会内容相关的语录。这一套程式过后才进入大会的正式内容。

首先由组织者发言，他手上拿着一叠讲演稿，对着麦克风振振有词地念着，喇叭里发出的声音就像读报纸，在座的就像在听广播。这声音反复强调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里去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无比重要性，居然将此与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与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联系在一起；与反帝反修的百年大计，无产阶级专政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联系在一起……头头是道，套话连篇，冗长的发言没完没了。

人们早已厌倦这种陈词滥调的说教，他们有意无意的哈欠、咳嗽、喷嚏声，慢慢地变成了一片低沉的嘈杂。

一个工作人员搀扶着一位七十开外的老太太上了台，在话筒前就座，然后对台下大声说：“大家静一静，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太，给你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大家鼓掌欢迎！”

台下的人们似乎没有听清她在说啥，只是跟着她的手势，稀稀拉拉地拍手附和了一下。

这位老太操着绍兴口音，像唠家常似的向大家诉说旧社会的苦：“……小时候，我家在农村，那个苦啊！没有书读，小小年纪就给地主家干活，受地主的剥削。青年时在工厂做工，受资本家的压迫，还要遭受日本佬的欺负……穷苦人全靠共产党，解放后，我们翻了身，当

家作了主人。”

台下一片肃静，人们都在认真地听着。

说到1958年至1960年这三年“自然”灾害时，这位老太抽泣起来，声泪俱下，她用手帕拭了拭干瘪的脸颊，然后身子向前倾了倾，说：“那几年的苦，那是真叫苦呀。粮票不够，饭吃不饱，炒菜没有油，番薯萝卜当饭吃，那是已经蛮好了……我的兄弟在乡下没有吃的，就饿出浮肿病来了……后来，后来……饿死了……”她老泪横流，呜呜的哭声通过麦克风充斥了整个电影场。

这时，台下出现了窃窃的低语声。明耳的人都觉得胡老太讲的是事实，但在今天这样的大会上，她离谱了。不过，台下的人们还是若无其事地听着。

最后，邬永康上了台，来到麦克风跟前，稳稳地站在发言席上，他清了清嗓门儿，压倒了全场所有的听众，一下子电影场里鸦雀无声。邬永康开始作大会的总结发言。

“是这样，”邬永康模仿着上司讲话的模式，开始打起了他的官话，“今天的动员大会开得很好，很成功！我们先作一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动员，响应号召的，现在就可以去街道的上山下乡办公室报名，去迁户口。先迁出的，我们考虑让他们去好一点的地方，如果晚了，那就没有照顾的可能了……”

邬永康打着官腔说着说着，便停了下来，鼠眉贼眼地朝台下俯视了许久。台下一双双冷静的眼睛看着这位很是威风的邬队长，人们想听听这位邬队长往下还说些什么。

喇叭里又发出了邬永康训话的声音：“过了春节，我们的动员工作就要全面铺开，以居民区为单位办学习班……总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三届毕业生都必须去支农，去支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嘛！”紧接着，他把话锋一转，加重语气地说开了亮话：“谁，要是在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调皮捣蛋，我们有的是治他的办法！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一回，统统都得去！”他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当然，有疾病的，家庭情况特殊的，我们

可以考虑照顾，这也是我们的一贯政策嘛……我讲的就是这些，以后就看你们的态度了！”他铿锵有力的话语回荡在电影场里，许久许久。

会议组织者上了台：“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唱！”

随着台上的手势，台下的嘈杂声转换成一种并不和谐的声响，跟着唱了起来。这是“文革”期间特有的会议结束方式。

男女青年陆陆续续地离开了电影场，没有嬉笑，没有打闹，无言的沉默掩盖着内心的不平静。他们像是刚参加过追悼会那样，情绪还没有从低沉肃穆的气氛中摆脱出来。

天黑了，西北风刮来了毛毛细雨，湿漉漉的地面映出了路灯的光亮，街上是那么的冷清，四下里显出了雨夜的神秘。

当天晚上，邬永康与他的一班人马在街道工宣队的办公室里，像是打完了一场战斗，胜利地抢占了阵地的制高点，大家都很兴奋。

陆二刚喝过酒，他裹着脏兮兮的值班大袍蜷在角落里打着瞌睡。郎大嫂像吃饱了撑着似的，精神十足地与在座的闲聊……

朱财根是邬永康的助手，他向队长递交了几张纸，恭敬地汇报报道：“邬队长，这是各居民区交来的关于三届生的情况报告，已经与各学校转来的名单核对过了，差不多。本街道共有动员对象一千三百多个。”他说着，一副抓耳挠腮的样子，唯恐队长批评他有什么不对似的。

其实，朱财根心里明白，不核对也是这么几个人，街坊邻居都在一块地方住，谁家有几个孩子在读中学，居民干部都知道，动员对象没有一个可以瞒得过去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虽然，他心里有这么嘀咕，脸上还是挂着笑，摆出一副十分殷勤的样子。

邬永康似乎没听见他在说什么，接过纸，习惯地用舌头舔了一下手指，眯着眼，迎着灯光，一张一张地翻阅着。朱财根见状，便从兜里掏出香烟，先递给队长一支，然后自己也叼上。

邬永康的眼睛盯在那几张纸上，手指却熟练地钳住了递上的那支烟，等待将烟点上。他慢吞吞地读出声来：“法院路，八十三；弼教坊，



七十六；官巷口，一百零四；教仁街，一百三十三；致和坊，七十五……对了，大家听着！”他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突然扯开嗓门儿说起来。

蜷在角落里的陆二也被叫醒了，他下意识地裹了裹棉大袍的衣襟，睁开一双还没睡醒的眼睛，用手指蹭了蹭鼻涕，傻乎乎地看了看周围，欲继续他正在做的梦。

邬水康正想展开说，一个工作人员从门外进来，说：“邬队长，外边有人找。”他听到后，放下手里的纸，便迎出门去。

门外的黑暗处，一位大妈站着，她手里拎着一个包包。

“哪个？啥事情？”邬水康探出头朝四下里张望，他不明白地问道。

“是我，邬队长。”这位大妈委婉地答应着，她的脚却没挪动半步。

邬水康走近了才看清楚，说道：“噢，是你呀，居民主任张师母……这么晚了，你有啥事情？”

张师母警觉地向周边看了看，满面堆笑地说：“邬队长，你真当辛苦呀，晚上还在办公室里开会呀！我没啥事情，就是……”她说话声显出了那么一点不好意思的味道。

邬水康是很灵光的。他八成已猜着张师母的来意，佯装关心地说：“张师母，你有啥事情，就直说嘛！这又不要紧的喽。”

“喏，邬队长，我的小儿子也是‘三届生’，就是，就是他的身体不大好，想……想托你邬队长照顾一下。”张师母说着，便提起了手里拎着的那只沉甸甸的包包，“这点年货……”

还没等张师母说完，邬水康已完全明白了她的来意，他的眼珠子转了转，故作正经地说：“张师母，你家有困难，可以提出来嘛，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听了这话，张师母陪着的笑脸显得有些尴尬。

“是这样，以后有啥事情，你可以到我家里来嘛！现在，我还有事……”邬水康只当没有看见张师母手里拎着的东西，说着，他欲回办公室。

听了这话，张师母心知肚明，顿时笑出了她的庆幸，接着便客气地说道：“哎哟，邬队长，已到过年脚边了，我还来麻烦你，真……真

当难为情啦。改……改日，我一定去府上拜访。”

虽然，张师母说话的声音很轻，邬永康却听得十分清楚，他又一次感受到掌权的魅力。

春节将至，人们都准备过年了。虽然也没有什么可忙碌的，凭票供应的那点副食品家家户户都是不肯放弃的。当然，单是凭票供应也挡不住紧俏商品从“后门”被人买走。这年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价钱昂贵的湖蟹甲鱼当时是餐桌上的上品，但是吃的人不用买，买的人却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求人办事送给吃的人。拿紧俏商品当作敲门砖是那时的一大“创举”，送者受者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张师母说着便离开了，她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邬永康拿下嘴边的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着发出暗红光亮的烟蒂，碾了一下，然后有意识地摆出两手空空的样子，走进了办公室，继续主持他的会议。

“……是这样。”邬永康开始了他的讲话，“动员大会已经开过，算是我们的舆论已经造出去了，这帮子‘三届生’的心里也该有数了。”他抖了抖手上的纸，接着说：“没几天，就是年三十了，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办动员上山下乡的学习班，先搞几个试点，声势造得大一点，力争把这批小鬼的户口百分之百地迁出，然后全面铺开……”他想到哪就说到哪，对着下属自由发挥是他的才能，他停了停，喝了口水，然后又拉着长腔说起来：“试点嘛，就是要影响大。知道的人多了，这影响就大了嘛。”说着又停了下来，若有所思的表情中显出了几分得意。他继而坚定地说：“对！过了春节，我就拿这个致和坊开刀！那里地方虽不大，人员集中，住户倒有不少，影响当然也就不会小！”他说着抬起头，脸上露出了征服者那样的笑。

办公室里仍是乱糟糟的一片。

2

致和坊，这是一个杭州城里小有名气的弄堂。坐落在西湖东南边的浣纱路上，毗邻延龄路、吴山路。弄堂口有个临马路的过街楼。

早年，这一带称作“旗下”，在杭州，此处算得上是繁华地段。因此，在这附近居住着许许多多的杭州市民。尽管这里的住房拥挤逼仄，但是，人们还是乐意在西湖边上有个安身的居所。在杭州城里，“旗下”确是一处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致和坊始建于民国15年。当时，杭州城的范围并不大，营造业主的慧眼认准了“旗下”这块生财的宝地，出巨资在此处大兴土木。

当时，致和坊的房屋是杭州城里为数不多的漂亮住宅。这是一处仿西洋式样的两层砖木结构的公寓房。

弄堂口是一个临街敞开的大门，上方有过街楼相连，两侧院墙对称，十八个格式结构完全相同的石库墙门，错落有致地均布在弄堂的两侧。门楣用水泥和石块构成，两侧是块石浮雕装饰的对称图案，所有立面一律是用八五砖砌成的灰色清水墙，房屋的门窗柱梁楼板全是整方有棱的花旗松制成。石库墙门结实坚固，还给人一种奢华洋气的感觉。

致和坊的墙门内都是一样的格式。进了墙门，走过天井，便是一个大客堂，左右是对称的前后厢房。过了客堂，便是后厅，一边有扶梯通往二楼，上了楼，一边通往阳台，一边进入楼厅，楼上楼下的厢房格式完全一致。

后厢房隔着一个采光的小院，墙边还有一口清澈见底的水井，为住户们提供冬暖夏凉的生活用水。

小院的后面便是一大一小两间青盖瓦平房，可当作厨房和杂物间，后门就在两间平房之间，门外有一条小弄堂通往大街。

早年，致和坊是杭州城里的上乘居所。因此，入住致和坊的房客大多是有钱人家。房客中，有贩运南北干货的商行老板，有经营零售百货的店主，有挂牌行医的郎中先生，有唱戏卖艺的名角戏子，有靠乡下田亩、城里房产吃饭的闲人，有达官贵人养着的姨太太，还有民国年间的遗老遗少……当然，这里还有过中共地下党的工作者，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的踪迹。

抗战时期，日寇曾经占领过致和坊。据说，有许多墙门是日本佬的营房。到了解放前夕，由于兵荒马乱，一些住户纷纷退了租、卖了

房，移居港台，或是到国外去了。因此，致和坊一度萧条了。那时候，房东只能以低廉的房价招揽住户。于是乎，在旗下一带谋生的小职员、附近学堂的穷教师、饭店里跑堂的、沿街摆摊做小生意的，甚至卖力气做工扛活的、拉黄包车的都纷纷入住。至此，致和坊几乎没有闲置的房屋。

杭州解放后，据说致和坊的房东去了台湾，二房东、三房东也不存在了，这里的房产都归人民政府收管了。这里的房客都成了租房的住户，他们中，有的是民国时期的有钱人家，但是，更多的是平民百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住户来自于社会的各阶层。十八个石库墙门里形成了一个拥有百十户人家的大杂院。自然，宽裕的人家租住较大的房间，室内宽敞明亮；贫困的人家则租住较小的厢房，屋里逼仄拥挤。

杭州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依山傍水，四周逶迤起伏的山峦环抱着一大片平坦的沃土，滋养着这里的芸芸众生。传说，杭州是一块佛地，有佛祖菩萨的保佑，整座城市就像佛国飘在水面上的莲叶，西湖就像漾在莲叶上的一盏秀水。

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旱涝天灾与杭州无缘。听老人们说：大旱之年，杭州从来不见水荒，上到江头下到湖墅，没听说过淘米洗菜的汲水井干涸过，在城隍山脚边，那眼挨着鼓楼的井里仍会荡着一汪清凉甘甜的泉水；大涝之年，钱塘江的水从未进过杭州城，西湖水也从未溢出湖岸漫进大街小巷。

杭州不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人们的记忆中，这里从未发生过两军对峙的激战。听老人们说，早在军阀混战时期，孙传芳的队伍进了钱塘门，杭州只倒掉了一座长年失修的雷峰塔。到了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日本佬只在大福清巷放了两炮就投降了。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从湖州临安一线向杭州挺进时，驻扎在杭州的国民党残部闻风丧胆，他们仓皇夺路朝宁绍方向窜去。杭州城的解放，几乎没有发生过炮声隆隆战火纷飞的局面。